

“双减”政策下基础教育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应对措施

肖爽

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湘潭

收稿日期: 2024年2月16日; 录用日期: 2024年3月18日; 发布日期: 2024年3月26日

摘要

“双减”政策以建设高质量的基础教育管理制度为重点, 促进形成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生态, 彰显教育公平的价值导向, 便于推进基础教育教学理念的深刻变革。本文通过分析现阶段落实“双减”的政策过程中基础教育管理遇到的主要问题, 进而提出应对措施。经过研究发现双减政策下的基础教育面对家校社对双减政策理解不够深入、作业管理办法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不够规范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 在“双减”政策下, 可以在完善基础教育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转变作业形式并优化作业管理方法、健全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监管模式等方面采取应对措施。

关键词

“双减”政策, 基础教育管理, 应对措施

The Mai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Basic Education Management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Shuang Xiao

School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Received: Feb. 16th, 2024; accepted: Mar. 18th, 2024; published: Mar. 26th, 2024

Abstract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basic education management system,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an education ecology conducive to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highlight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educational fairness, and facilitates the promotion of the profound reform of basic education teaching concep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basic education management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policy of “double reduction” at the present stage,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Through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basic education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is faced with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cy, the in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peration management methods, and the insufficient supervision of after-school training institutions. In the face of these problems, under the policy of “double reduction”, countermeasures can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coope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of basic education families, schools and societies, change the operation form and optimize the operation management methods, and improve the governance and supervision mode of after-school training institutions.

Keywords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Basic Education Management, Response Measures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双减”政策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是推动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的重要举措[1]。“双减”政策以建设高质量的基础教育管理制度为重点，促进形成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生态，彰显教育公平的价值导向，便于推进基础教育教学理念的深刻变革[2]。“双减”政策下，在基础教育管理过程中坚持系统思维和问题导向，统筹校内和校外，使学校的育人质量得到真正的提高，同时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经营行为进行不断的规范，各相关部门协同发力，一起来解决基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以推进“双减”工作扎实开展。本文通过分析现阶段落实“双减”的政策过程中基础教育管理遇到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应对措施。

2. 双减政策下基础教育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分析

2.1. 调查设计

本文采用了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随机抽取了 2500 名处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的家长作为调查对象，发放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家校社协同机制建设情况、学校教育管理情况、学校作业管理情况、学校课后管理情况等。最终回收了 2436 份，有效回收率为 97.44%。由此通过对调查研究收集来的信息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再结合实地走访，对双减政策下基础教育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成因进行深入的研究。

2.2. 双减政策下基础教育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2.2.1. 家校社对双减政策理解不够深入

“双减”政策是以减轻家长和学生的负担为出发点[3]。但调查显示，24%的家长对“双减”的政策并不了解，依然对课外补习抱有很大的依赖性，觉得只能靠请家教来弥补功课。见图 1 所示，92%的家长意识到实施“双减”改革的目的是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然而能够认识到“双减”改革

其他目的均没有达到 30%，这说明家长对“双减”的认知只限于字面意义，无法将其与学校活动、管理措施联系起来。12%的家长保持与培训机构联系，或花大价钱找“一对一”补习，16%的家长买辅助教材、练习题、作业题等，这都显示出家庭教育中旧思想的顽固，也显示出来自家庭的阻力远大于我们所想。这也反映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政策宣传力度不够，导致一些父母对“双减”的认识不足，并未认识到家长才是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若家庭外部压力减少而内部增加，对学生来说，其负担的压力并未发生变化，最终“双减”政策也将以失败告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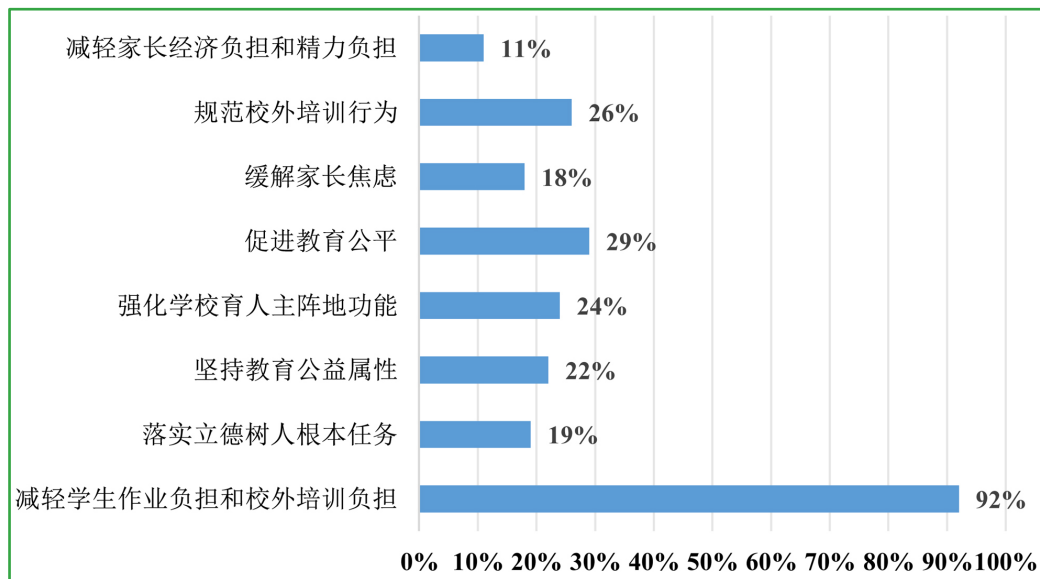


Figure 1. Parents' cognition of the purpose of implementing the double reduction reform
图 1. 家长对于实施“双减”改革的目的认知情况

2.2.2. 作业管理办法没有得到有效落实

从调查结果来看，参加调研的地区，100%的学校都对作业时间进行了管理部署，但是经过研究，学生周一至周五课后完成书面作业平均时长见表 1 所示，发现学生作业仍存在超时长的情况，并且学生的作业形式普遍太过单一，缺少实践性和趣味性。经过问卷调查，88%的家长对于学校“双减”政策下的作业管理表示不满意，觉得作业的内容还不够针对性，只是简单地把教辅材料给他们布置了一些简单的作业。这表明，作业管理办法和实际的管理存在着脱节的现象，有执行不到位，打折落实的情况。目前，在班级、学科、学生和家校合作四个层面上，家庭作业管理制度还不够完善。

Table 1. The average length of time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o complete written assignments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management

表 1. 基础教育管理中 学生完成书面作业的平均时长

指标	比例
1、2 年级无书面作业	91%
1、2 年级有书面作业	9%
3 至 6 年级小学生小于或等于 1 小时	86%
3 至 6 年级小学生大于 1 个小时	14%
7 至 9 年级作业小于 1.5 小时	71%
7 至 9 年级作业大于 1.5 小时	29%

2.2.3. 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不够规范

通过对校外培训机构存在问题情况进行调查, 见图 2 所示, 13%的家长认为有的学科类培训仍然存在“提前学学科知识”、“占用法定节假日、周末进行培训”的行为; 15%的家长认为有的学科类培训转入地下, 存在监管“盲区”; 11%的家长认为有的非学科类培训以“作业培训”“英语阅读”“研学活动”等名义变相违规开展学科培训; 42%的家长认为有的非学科类培训价格不合理, 推高了家庭教育支出; 54%的家长认为有的非学科类培训机构教师素质参差不齐, 影响培训质量; 12%的家长认为有的非学科类培训机构收费通过微信、支付宝等转入私人账户, 且预收费多、退费难, 机构一旦跑路, 家长维权难; 31%的家长认为有的培训机构教学环境差、设施不完善、存在安全隐患。校外培训分类管理机制不健全, 增加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监管难度, 弱化了“双减”政策的实践成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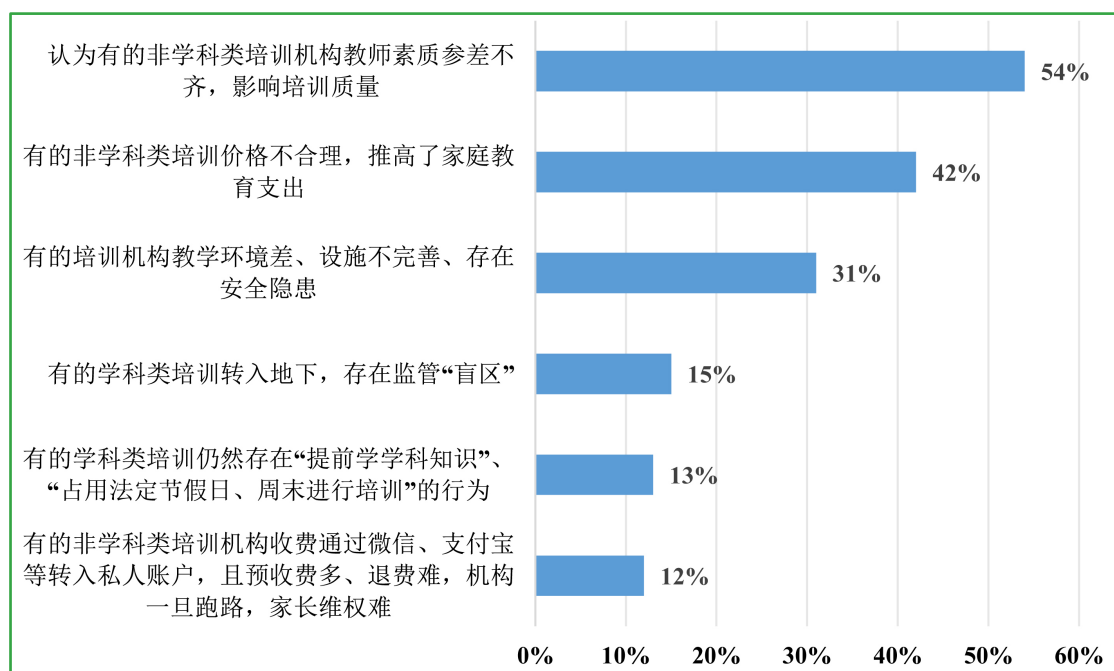


Figure 2. Parents think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in the external train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basic education

图 2. 家长认为基础教育管理中校外培训机构存在问题情况

2.3. 双减政策下基础教育管理面临主要问题的成因

2.3.1. 家校社多方统筹协调机制不够完善

“双减”政策的实施, 要有多个部门的统筹协调, 各个部门之间要进行协作, 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是对学校的管理,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建立起一个职能清晰、管理严谨、运行有序的管理体制, 这就造成了基础教育管理的质量与效率低下。一是在国家层面上, “双减”政策没有得到充分普及, 社会、家长和学生都没有充分认识到“双减”的重要性[4]。在学校层面上, 要加大宣传力度, 尤其是缺乏“双减”主题的家长开放日、家长会等家校互动方式。二是对“双减”教育在各地区、各学校的好的经验、好的做法没有进行深入的挖掘, 对主流媒体、网络平台的政策宣传还不够。好的榜样可以带动家庭、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的观念转变, 形成良好的学习气氛[5]。当前, 家校社合作育人的机制还不够健全, 没有丰富的家委会、家长会、家访等形式, 学校与家长之间的交流渠道还没有完全打通, 家、校育人职责不明确, 也让家长感到负担沉重。

2.3.2. 作业减量与课堂提质之间缺乏联动

“双减”政策下，我国中小学教育革新突出素养导向，却忽略了以素质为导向的作业改革。作业和课堂是分不开的，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设计和执行[6]。不然仅仅减少作业的量，忽略了作业与课堂之间的联动关系，就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减负。在学校的实际操作中，没有将作业与课堂的学习联系起来，作业管理的改革和提高课堂的质量不能同步，教学评估也就不能真正落实。社会上最关心的是作业减没减，教育主管部门先从数量上看看有没有减下来，作业完成的时间有没有达到标准。在作业的管理上，最重要的就是在时间上控制数量，在形式上变换花样，而与之对应的作业质量、学生与作业的匹配程度、作业的形式和内容的合理性等方面，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对作业的管理仍然是一种浅层次的管理，它必须按照教师的教学目标来进行设计，并且要和课堂里的学习活动进行互动，这样才能让作业真正地发挥出它的教育作用。

2.3.3. 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体系不够健全

目前，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这只是一种短期的、有针对性的整治，缺乏科学的、系统的管理制度，应当注重构建多元互动的、能够引发良性循环的治理生态。当前，首先，缺乏专门的校外培训机构监督人才[7]。教育市场监管、网信、公共安全、体育、社会文化和旅游等相关部门的相关单位，也要在各个职能领域设立专门的工作人员，对本领域内的教育工作进行独立的或联合监管。二是要加强对各种校外培训机构的管理，缺乏相关部门对其进行有效的引导与监管，在对教师资质、培训教材、培训课程等的管理上，要对其进行制度化和标准化管理，以防止出现学科类培训的反弹。三是按照法律规定，对培训机构不法行为进行严格的整治，整顿工作力度还不够，并且开展联合检查和明察暗访的工作机制尚不健全。

3. 双减政策下基础教育管理的应对措施

3.1. 完善基础教育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

3.1.1. 促进家校沟通

构建共同育人组织，并使之成为学校与家庭交流的重要基础。第一，可以通过成立家校工作委员会，明确各自的责任，积极参与到学校的开放管理中。第二，可以成立“家长学校”，举办“家长大讲堂”和“家校共育”研讨会，邀请教育专家到学校为教师及家长讲座，剖析目前“家校共育”的状况，并为“家校共育”提供指导[8]。第三，可以建立家校合作领导小组，统筹社、家、校三方的工作，制定方案，组织实施各项活动。第四，可以成立面向家长和学生免费开放的心理咨询工作室，能及时解决学校遇到的各种紧急情况以及学生个性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由此逐步形成一种教学合力，促进青少年的健康发展，同时也有助于监管“双减”政策的实施。

3.1.2. 完善社会服务

首先，可以在政府的主导下，建立一个“全方位的校外素质教育供需平台”，将校内外的教学、科研、文艺、社会公共服务等组织和机构的场地、人才、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资源整合起来，联合制定学校素质教育供需清单。其次，根据清单中明确的需求主体、需求范围、方式和业务类别，为其提供一对一的精确咨询服务。把学科和专业的教育资源移交给学校，使其在政府的经营下得到更好的利用，从而和学校进行素质教育的发展形成互补的局面。比如阅读、运动、音乐、美术、舞蹈等方面的兴趣爱好培养项目，以及研学旅游、缅怀先烈、科学教育、心灵开拓、志愿工作等社会活动，并积极地组织学生到附近的社区开展实践，让他们在实践中了解社会，认识祖国。再者，为学生提供一站式的校外素质服务资源，并在垂直方向上，将市、区、校等多个层次进行跨层次的沟通，横向上与教育、体育、科技等多个

部门进行合作，将管理和审批整合起来，从而达到更高效的管理和服务。

3.2. 转变作业形式并优化作业管理方法

3.2.1. 转变作业形式

在学校学习模式的优化中，作业改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行“一校一案”、“一层一策”、“一生一策”，以作业促学。强化理论指导，提高教师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引导他们通过选编、改编、自主创作等方式开展优质的作业，并大力推广“基础作业 + 弹性作业”、分层作业、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标准化作业，开发工作类、活动类、家务劳动类等新型作业，指导学生通过课后学习，实现对知识的转化应用、感悟体会和新的思维。

3.2.2. 优化作业管理方法

首先，对区域运作管理工作进行顶层设计，构建“五主一辅”的区域作业管理体系；一是由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制定、监督、管理和指导学校的政策、法规；二是由教育科研工作者进行家庭作业的设计、执行计划的研究、教师的辅导等工作；三是对学生的作业时间进行监控，对学生的作业质量进行监测，建立学生的资源库；四是教师进行家庭作业的设计、实施和质量评估[9]；五是教师要在学生的作业习惯、作业方法上下功夫，要鼓励学生自学，教师要主动预习。六是校长和班主任通过家长来协助家庭教育，给中小學生创造一个好的学习氛围，指导家长在作业注意度和习惯养成方面的协助管理等。其次，实施“以人为本”的学校治理模式，将作业设计和执行纳入到学校的课程一体化管理之中，以学年为单位进行单元整体作业的设计，重点是要在时间上进行突破，并逐渐建立起具有区域特色的作业管理机制以及作业设计的完善的实施方法。最后，还可以对学校的作业管理和设计进行专门的培训，组织各种评比、案例征集竞赛，总结经验，推广典型，并进行专项督导。

3.2.3. 健全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监管模式

要把握好时间节点，抓住重点，强化培训引导。首先，要推动责任的协同。充分利用市相关部门成立的“双减”专项协调机制，共同研究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协调和推动各区部门之间的合作，指导各区建立健全排查、巡查、查处等工作机制。其次，要注重创新，要有效率的巡视。通过多次摸底调查，建立双工作台账，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对重点巡查区域进行科学研判，创新建立分片包干、错时值班等工作方法，对学校教育问题进行严厉查处。第三，寻找线索，精确打击。市、区、校三级单位对群众举报进行公开监督，发动群众力量将隐形变异培训机构进行查处，保证了整治的高压态势。同时，积极利用招聘网站等多种途径，对违纪违法线索进行挖掘，并进一步拓宽线索来源。第四，严厉打击，增加宣传力度。通过“约谈一批、查处一批、曝光一批”的方式，及时对“黑名单”和“白名单”进行动态更新，对违法的培训机构进行“黑名单”公示，起到一定的警示和威慑作用[10]。强化寒暑假重点时段的专项督查。第五，要弥补缺陷，加强法律的执行力度。加强对校外培训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将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日常监管纳入基层区镇、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网格管理体系，并在每个街道办事处派驻教育指导员，以减轻教育部门执法力量不足的状况。第六要广泛宣传，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各区学校还可以通过公众号和短视频等方式，让家长们在假期里多注意子女的自我发展，提高家长的陪伴质量。

4. 结语

基础教育管理是建设一个良好的教育生态系统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双减”政策的推行，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如家校社对双减政策理解不够深入、作业管理办法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不够规范等。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家校社多方统筹协调机制不够完善、作业减量与课堂提质之

间缺乏联动、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体系不够健全导致的。面对这些问题，“双减”政策下，可以通过完善基础教育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转变作业形式并优化作业管理方法、健全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监管模式等方面采取应对措施。就是要以多种方式推动家长学校活动的开展，并对政府治理下的社会教育服务方式进行探讨，为基础教育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使家、校、社关系得到更好的建设。要完善作业管理制度，促使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以作业管理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要健全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督制度，建立起多个部门共同治理的监督方式，健全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管理监督体系。由此在“双减”政策下，营造出基础教育的良好文化氛围，充分发挥出基础教育管理为人民服务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袁广利. “双减”政策与提高基础教育质量[J].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22, 38(4): 70-72.
- [2] 乔雪峰. “双减”政策下撬动基础教育转型的政策杠杆分析[J]. 南京社会科学, 2022(12): 145-154.
- [3] 余宇, 阙明坤, 杨开勇, 单大圣. 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负担治理: “双减”政策及长效机制建设[J]. 管理世界, 2022, 38(7): 163-170.
- [4] 王珺. “双减”政策背景下基础教育改革的问题及策略探析[J]. 豫章师范学院学报, 2022, 37(4): 121-124.
- [5] 刘光萍, 马香莲. 基础教育“双减”政策的目标取向及实践路径[J].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 2022, 38(2): 1-6.
- [6] 韩富军, 汪玲. “双减”政策下单元作业设计的流程与建议——基于基础教育精品课作业设计的思考[J]. 化学教学, 2022(11): 78-81+97.
- [7] 王文芳, 王亭亭. “双减”政策视域下基础教育教学变革路径探析[J].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 33(3): 101-105.
- [8] 宋晨, 冯旭芳. 基础教育领域“唯升学”: 成因、影响与治理——落实“双减”政策的视角[J].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教育版), 2021, 41(2): 23-28.
- [9] 吴彤. “双减”政策下基础教育阶段学生作业的转型与重塑[J]. 科教导刊, 2022(6): 129-131.
- [10] 段雨, 孙艺宁. “双减”政策落实背景下基础教育领域内卷化的破解策略[J].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 2022, 38(3): 8-15.